

信仰如山 风骨长青

——新四军第五师老战士杨玉麟的红色人生与育人情怀

全媒体记者 赵慧林 通讯员 金姣

编者按

6月15日,以新四军第五师老战士杨玉麟名字命名的“杨玉麟奖学金”在随州一中正式设立。从随南杨家湾的农家少年,到白兆山下的革命战士,再到乡村教育的耕耘者,杨玉麟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“枪杆子”与“粉笔头”的接力,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。这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奖学金,不仅是对一位随州籍革命先辈的深切追思,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。

随州,从来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鄂北重镇。对新四军第五师战士杨玉麟而言,这里是革命信仰的扎根之地,是精神品格的锻造之所,更是他毕生守护与奉献的家园。从随南杨家湾的乡间小路到白兆山的烽火战壕,从鄂豫边区的枪林弹雨到随县乡村的三尺讲台,他的一生与随州的山山水水紧紧相连。今天,我们以奖学金的设立为契机,重读这位老战士、老校长的人生篇章,让那些散落在随州沟壑间的红色记忆穿越时光,向我们走来。

信仰如磐 投身革命淬忠诚

1921年,杨玉麟出生在随南杨家湾。旧社会的黑暗统治、土匪恶霸的横行无忌,让他自幼尝尽人生疾苦。然而,勤劳朴实的母亲以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嫉恶如仇的性情,为他注入了最初的精神底色。面对艰难困苦,她乐观坚韧;面对困苦乡亲,她满怀同情;面对战乱,她义无反顾地支持儿子参加革命。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随州母亲,托起了鄂豫边区的抗日烽火。

1938年10月,武汉沦陷,日寇铁蹄踏踏华中,山河破碎,民族危亡。1939年,年仅18岁在应城矿区做工的杨玉麟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。次年,他随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(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)返回家乡,进驻随南白兆山。在随南连绵的山林间,杨玉麟走村串户发动群众、宣传抗日主张;参与建立基

层政权,积极减租减息,动员青年参军;在密林沟壑间开展武装斗争,打击日伪势力。在血与火的考验中,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此后,他历任随南县军政联合办事处和平乡政治指导员、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七团一营二连政治指导员、中共随南县周河区委书记、新四军第五师第二军分区白兆山医院政治指导员等职,期间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,系统学习革命政策和军事理论。从乡野到军营,从地方到部队,从政治工作到军事指挥,他在战火中一步步淬炼成长。

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,杨玉麟临危受命,负责将人民军队一批伤病员转移出敌军重重包围的中原解放区。他精心筹划转移路线,带领20名医护人员、

158名重伤员,组织650名群众担架队,紧紧依靠沿途地方党组织的支持,一路斗智斗勇,在国民党哨卡中艰难穿行,最终将重伤员送往安陆杨新街,圆满完成任务。随后,他服从组织安排,化装隐蔽,在府河、马坪、长岭一带坚持地下斗争,以极大的忠诚与坚韧保存了革命火种。

“革命者心里要装有信念,要装着群众,脚跟要站在泥土里。”这是杨玉麟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,他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把对党的忠诚刻进骨髓。无论是枪林弹雨的战场,还是化装隐蔽的地下斗争,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,站在人民一边,站在真理一边,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如磐。

化剑为笔 三尺讲台守初心

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,杨玉麟回到随县,走上教育战线,先后担任小学教员和校长。这种从“枪杆子”到“粉笔头”的转身,变的是战斗岗位,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本色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全国教育事业都处在起步阶段,乡村的教学条件尤为艰苦。没有教室,杨玉麟跑遍附近几个村子,选取废弃的寺庙或祠堂供学生上课;没有课本,他带着教员一起编写乡土教材;没有桌椅板凳,他带头把自家的桌椅搬到学校,又带着师生用土坯和木板搭起简易课桌。有

教员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,他默默把自己的棉衣送去;有教员家里揭不开锅,他掏出微薄的工资予以接济。他常说:“我是干革命出身的,革命者以革命为家。现在解放了,国家建设需要更多的人,我们教育战线上的每一个人,要甘当蜡烛,照亮他人,牺牲自己。”在杨玉麟的努力下,学生的学习条件和教员的生活状况逐步改善,学校成为了师生的温暖家园。

杨玉麟以校为家,潜心钻研教法。他逐户走访,了解学生的特长和兴趣,坚持因材施教,不断调整教学内容,将乡

土知识、生活经验融入课堂;他大胆革新教学方法,以实地考察连接书本知识与生活,让课堂走出教室,使学生生动而具体。他还组织学生参加书法、绘画、诗歌朗诵等比赛,让学生充分感受文化的魅力,点燃他们对知识的向往。那些曾经怯生生的农家孩子,渐渐敢在课堂上大声朗读,敢在土墙黑板上写下自己的第一首诗。杨玉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位革命者、教育者的信仰,如同梦想播种者,让广大农村的孩子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,为中国农村教育播撒了希望。

清贫守道 俭以养德铸风骨

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。杨玉麟的俭朴,近乎苛刻。他一生不嗜烟酒,不碰牌局,粗茶淡饭,睡硬板床,盖的是补丁摞补丁、棉絮早已板结的旧棉被。冬夜寒气透骨,他便把白天穿的粗布衣裳叠压在被上御寒,始终舍不得添置新棉胎;一件粗布外衣补了二十来次,穿了十年,袜子补了又补,搪瓷脸盆和漱口杯生锈了还不舍得丢弃,连喝水用的老竹筒开裂了,拿铁丝箍紧继续使用。

经济困难时期,他带领师生开荒种菜、喂猪养鸡,改善师生伙食,减轻学校负担。他还常把领来的口粮分给其他教员,自己用红薯干掺野菜充饥。儿子杨树德小时候总不明白,为什么父亲的书包里除了课本,总装着半块舍不得吃的黄馒头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留给那些饿着肚子来上课的孩子的。他常教育学生要懂得感恩:“目前国家还很贫困,我们要有计划地索取,有节制地

消费,在艰苦奋斗中克勤克俭,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学校的正常运转,保证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。”

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。通过亲身示范和耐心教育,学生们逐渐养成了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好习惯,杨玉麟带给学生的既有知识学识,更有精神指引,助力大家端正价值取向、锚定人生方向,守本心、立远志,在成长之路上步履不停。

薪火相传 崇文重教启后人

在鄂豫边区,像杨玉麟这样自幼读私塾、能文识字的老战士并不多见。这份文化底子,让他枪林弹雨中显得格格不入。投身革命后,即便战火纷飞、一日三迁,他也始终把读书识字当作另一场战斗。在抗大第十分校的学习中,在行军打仗途中,他的背包里除了枪支弹药,总小心翼翼地夹着几张从敌占区缴获的破旧报纸、从老乡手里借来的旧书。他常把《七七日报》《挺进报》等边区报纸一字一句地读给战友和群众听,还教他们认字写字。杨玉麟从最简单的字教起,用树枝在泥地上划,用硬土块在石板上写。有战士第一次写出自己的名字时,激动得彻夜难眠。这份对文化知识的执着与坚守,既是他个人风骨的底色,也为他日后脱下军装、拿起粉笔打下了基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党史抢救工作刻不容缓。作为新四军第五师战士,作为革命的亲历者,杨玉麟以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,参与《随州革命斗争史》《烽火白兆山》《新四军第五师老干部回忆录》《新四军第五师卫生工作简史》等

多部著作的撰写。年逾花甲的他,仍翻山越岭走访老战友,核对战斗细节;夜晚,他常在煤油灯下整理笔记,花白的头发在昏黄的光晕里微微颤动,粗糙手指捏着笔,在泛黄的稿纸上艰难书写。有时,为核对一个地名、一个日期,他翻出珍藏多年的旧笔记,戴上老花镜反复比对到深夜。孙儿们醒来,常看见爷爷佝偻的背影映在土墙上,像一幅沉默的剪影。他不言语,却以一言一行诠释了什么叫对历史的敬畏——那是老兵对牺牲战友的交代,更是革命者留给后人的精神火种。

书香传家远,崇文重教厚。杨玉麟对孙辈的教育特别重视。他的教导不是空泛的说教,而是日复一日的躬身示范。孙儿们到了学龄,他买来毛笔,把泛黄的旧报纸铺平,蘸着墨汁,一笔一画教孩子们练字。他握着孙儿的小手,从“人”字写起:“字如其人,横要平,竖要直,撇捺要有力。做人也一样,横平竖直,堂堂正正,才能站得稳、立得正。”孩子们写歪了,他不呵斥,只是指着歪歪扭扭的字迹说:

“你看,这一横斜了,就像人走路歪了肩膀,看着就不精神。重来。”就这样,他让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规矩,什么是风骨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下,家中孙辈人人学有所成,在各自领域攻读深造。走上工作岗位后,有的像爷爷一样成为人民教师,在三尺讲台延续那份甘当蜡烛的情怀;有的投身国家发展的重要行业和领域,以真才实学报效祖国。无论身在何处,他们始终记得爷爷的话:“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
杨玉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余年了,但他的精神从未远去。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无声无形,却比任何言语都更真切地诉说着:何为信仰,何为清贫,何为传承。如今,“杨玉麟奖学金”在随州一中设立,正是对他精神的最好赓续。这份承载红色记忆的奖励,于青年学子而言不仅是物质的资助,更是精神的接力。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,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——这,便是对杨玉麟同志最好的纪念,正如随南山间的松柏,风骨铮铮,万古长青。



▲ 1949年杨玉麟摄于武汉



▲ 1943年豫鄂边区政府颁发给杨玉麟(林)的抗属优待证

